2014 年 11 月　　清史研究　　Nov. 2014
第 4 期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No. 4

读史札记

乌尔古岱案补释

陈永祥

由于史料的匮乏和清朝文献的隐讳，从金国建立到清朝入关前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团。譬如，天命八年（1623）发生的乌尔古岱案，就是一桩迄今尚未完全弄清的扑朔迷离的疑案。

乌尔古岱①是海西女真哈达部末代首领猛骨孛罗的长子，其家世背景十分显赫。万历中期，哈达部为建州女真灭亡，猛骨孛罗被杀，乌尔古岱被努尔哈赤收为女婿，羁留于建州。金国建立后，乌尔古岱成为金国的一员战将，征战沙场，立下了战功，先后被授予副将、总兵官之职。天命七年，乌尔古岱升任都堂，参与审断金国内部各种案件，不久成为第一都堂。八年二月，在金国进行官制改革的背景下，在八和硕贝勒（“八王”）之下设置都堂八员，称“八大臣”。八都堂拥有处理金国军政司法等事务的大权，同时负责对“八王”进行监督、劝谏和弹劾。乌尔古岱作为首席都堂，是金国中掌握司法大权、处理军政事务的最高将官，地位与权势仅在“八王”之下。然而，好景不长，六月，汉官复州备御王彬、永宁监备御李殿魁控告乌尔古岱收受贿赂。众断事官和诸贝勒审理后，拟乌尔古岱以死罪，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等四贝勒因牵涉其中，亦被参劾。报呈汗后，努尔哈赤令免议乌尔古岱死罪，革其都堂之任，降为牛录备御，并限制其人身自由。乌尔古岱由此权势尽失，皇太极等人亦遭罚处。因该案的发生和审处过程疑点颇多，被视为金国入辽后的五大疑案之一。②

既有研究依据清朝方面的文献记载（主要是《满文老档》），将乌尔古岱案与前后连续发生的阿敦被幽禁、额尔德尼之死、皇太极遭训斥三大疑案相联系，置于金国内部权力争斗和政局变动的环境中进行解释，指出：随着努尔哈赤年老，金国面临严重的立嗣危机，四大贝勒（尤其是代善与皇太极）之间争夺汗位继承权的斗争日趋激烈，矛盾日益尖锐。皇太极利用金国政局的变化，不断扩大自身势力，拉拢济尔哈朗等小贝勒，形成以其为首的集团。这些举动引起了代善等人的严重不满，也形成对八王共治国政制的挑战。代善等人借乌尔古岱之事对皇太极集团进行打击，促使努尔哈赤对皇太极等人进行惩处。乌尔古岱、阿敦、额尔德尼等人均因卷入了金国最高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而成为其中的牺牲品。③ 这些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尚未能廓清笼罩

---

① 乌尔古岱是《大清一统志》的写法和《满文老档》的译法，清代文献中另作武尔古代、吴尔古代、吴儿户代、吴尔瑚达等，明称吾儿忽答、吾儿忽奔、兀儿忽达、兀尔忽答、王哈赤等，朝鲜文献作吾乙古多、兀古大等。

② 参见周远廉《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 384—391 页；周远廉《清太祖传》，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580—587 页。其余的四大疑案为扈尔汉被革职、阿敦被幽禁、额尔德尼被杀、皇太极被斥，参见周远廉《清朝兴起史》，第 354—383、391—398 页；周远廉《清太祖传》，第 547—579、587—597 页。

③ 周远廉《清朝兴起史》，第 366—398 页；周远廉《清太祖传》，第 561—597 页；杨珍《后金八王共治国政制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 年，第 32—42 页；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年，第 92—95 页。

在乌尔古岱案上的迷雾。笔者在明朝文献中发现若干涉及乌尔古岱的记载，这些记载表明，乌尔古岱一案并非如人们所已知的那般简单，其背后还掺杂着明朝的离间因素，需要结合明金对峙的局势变化进行解释，方能破解这桩疑案。

乌尔古岱得势、失势之时，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进驻辽东后，金国实行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民族压迫政策，引起汉民的强烈不满。汉民以起义和逃亡为主要形式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遍及整个金国辖区。明朝借机派遣大量“奸细”进入金国，对金国中的汉官和汉民进行策反、离间。据《满文老档》载，毛文龙一次就派遣50名“奸细”进入金国。金国下令各地严加防范，对擒拿明朝“奸细”之人予以记功，对知情不报、不行拿送之人治以灭门之罪，不少人因擒获“奸细”而升职。① 这显示金国在应对明朝的“奸细”问题上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是时，明督师孙承宗、登莱巡抚袁可立、登州总兵沈有容等人也派出间谍进入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等地，对当地的汉民和主管这一地区的汉官刘兴祚等人进行招降。② 明朝的离间、策反，加剧了金国的混乱。金国统治者由是对汉官、汉民产生怀疑，逐渐疏远汉官，李永芳、刘兴祚等人遭到贬斥，汉官的离心倾向日益增强。与此同时，金国的政局也因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而发生激烈的动荡，核心大臣扈尔汉、阿敦、额尔德尼等或遭罢职，或被诛杀。这一系列同时发生的事件使金国的统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明朝方面，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九月孙承宗督师后，大力整顿关门军务，逐渐收复关外的一些失地，明军兵势渐张。金国于是在天命八年三四月间撤守广宁。③ 鉴于金国陷入困境和明金对峙局势的变化，孙承宗着手部署关前各处防守、进取事宜，并遣人离间、招徕被努尔哈赤兼并的海西女真各部。兵部在天启三年六月议覆孙承宗奏疏时提到:

> 枢辅（即孙承宗）议防奴（努尔哈赤，指代金国），以王威、孙祖寿二总兵驻永（平）、遵（化），固二路之守；以尤世禄、王世钦二总兵驻宁前，张掎角之势；以马世龙材可调度，联四部之呼吸，参战守之机宜；而又侦广宁之空也，议以夷官副总兵王世忠统兵三千居之，亲虎酋（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明称虎墩兔憨），而招金、白（叶赫部首领金台石、白羊骨）之裔落。总之，离夷（金国）、虏（蒙古）之交，系归正之心，寓进取之计，动则使我无失算于奴，静则使奴不能得志于我，可谓算无遗策矣。④

孙承宗派遣前往广宁的王世忠，原名革把库（又作克把库、揭力库），是猛骨孛罗的次子，乌尔古岱之弟，哈达部灭亡后入明，受明朝抚养长成，原在广宁为加衔游击，孙承宗督师后，因王世忠与察哈尔部林丹汗为姻亲，用之为译审馆副总兵，用以抚驭察哈尔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⑤ 金国撤守广宁后，察哈尔部驻广宁城外，孙承宗遂遣王世忠统兵入居广宁，依托察哈尔部，利用其特殊的身份，暗中招徕金国中的哈达、叶赫、乌拉、辉发等部人众，以瓦解金国的势力。这是孙承宗战略部署中的重要环节。在之后所奏陈沿海进取部署的奏疏中，孙承宗更加明确地陈述其战略意图:

> 一（以）皮岛之师伺宽（甸）、叆（阳），以广鹿之师伺金（州）、复（州），以觉华之

---

① 《满文老档》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427—428、431、442、443—444、451、455、466页等。

②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7《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以下简称《孙承宗行状》），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390册《明熹宗实录》卷36，天启三年七月甲寅；董其昌《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见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068册，第253页《满文老档》上册，第520页。

③ 《满文老档》上册，第445—446页。

④ 《明熹宗实录》卷35，天启三年六月癸亥。引文括号内文字为笔者加注，下同。

⑤ 张鼐《辽夷略》，收入《玄览堂丛书初辑》第23册，正中书局，1981年，第558页；冯瑗《开源图说》卷下《海西夷南关支派图》，收入《玄览堂丛书初辑》第5册，正中书局，1981年，第450页《明神宗实录》卷594，万历四十八年五月戊戌；茅元仪《督师纪略》卷4，《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6册，第342页；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7《孙承宗行状》。

师伺海（州）、盖（州），再以夷官（即王世忠）结虎酋，而招携于广宁，则分防之地多，而贼（金国）不得不分，分而防之，其途广，则合而入之，其力微。故臣欲以（毛）文龙当其髀胫，以（沈）有容当其胸胁，以觉华、广宁当其肩背……夷官之倚虎酋也，夫岁费数十万抚夷而遽敢侈言为我杀奴，然夷官之可倚也，有机要亦督臣原议而借抚夷之力。故议当定，议定而三镇成，三镇成而奴譬全身已无完肤。①

总的来看，孙承宗的战略意图是，通过分解金国的势力，达到分而制之的目的。所以，王世忠出驻广宁是招徕海西女真各部这一策略的具体实施，直接关系到孙承宗战略意图的实现。孙承宗同时将锦衣卫官项俊卿调出，以佐王世忠。②

乌尔古岱也是明朝的招徕对象，孙承宗冀图通过招徕乌尔古岱，离间海西女真各部与金国的关系，进而招徕海西女真各部。为实现这一目标，孙承宗谋划离间乌尔古岱与金国的关系。乌尔古岱虽为金国之婿，但与努尔哈赤亦有不共之仇。朝鲜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接到的情报中就曾提到乌尔古岱与努尔哈赤之间的“翁婿之患”：

奴酋（努尔哈赤）之婿吾乙古多，乃故名胡王太（王台）之孙也，其父之兄自少伶俐，见爱于天朝，至受官爵在天朝时仕者也。奴酋作婿时，先杀其父子应巨，故宿有不共之仇，而威力所劫，强为从行，名虽为婿，实为仇敌，阴怀报仇之心，潜结其所亲者，通于如许（叶赫部）、蒙古等处，又缘其三寸密书于天朝，为自当内应合击奴营之计。其妻告变其父，奴酋大怒，即绑缚囚之，同谋头头胡七名先为磔杀。③

乌尔古岱与金国的这一微妙的关系也是明朝所熟知的。乌尔古岱的得势与失势便为明朝实施离间之计提供了机会，而乌尔古岱与王世忠的兄弟关系则成为明朝利用的感情资源。如陈仁锡就认为，乌尔古岱和王世忠“兄居奴穴，弟在天朝，此正防微之一渐、用间之一机。”④ 孙承宗重用王世忠，本身就隐含着招徕乌尔古岱、离间金国部族的意图。钱谦益《孙承宗行状》云：

南关（指哈达部）之遗孽揭力库归汉曰王世忠，世忠之兄世勋，为奴伪都堂用事。公（孙承宗）思显南关之后，招来南北关（哈达部和叶赫部）、灰扒（辉发部）、鱼皮（乌拉部）诸虏，结虎酋之比妓而柔虎酋，因以招世勋而间之，乃以世忠为副总兵，主译审馆。⑤

王世忠此次出驻广宁，正是孙承宗对金国实施的离间之计。此事在当时属于军事机密，知道内情的人并不多。孙承宗的幕佐鹿善继在致同僚的书信中说：

盖师相（指孙承宗）欲蓄王世忠，于年前脱自己袍着之，彼时广宁失守，而师相远猷，已打算着数。特兵，阴道也，不欲先泄，而今则时至矣。虽然，心师相之心者，似翁丈几人哉？揶揄王世忠者，即同室之人，其机彀可畏可虑。师相于此，良工心苦，可泣鬼神，欲从欲逆，两属未便，而后师相之妙用始见，即安排项兰斋（即项俊卿）亦自有深意。大约事至于此，无可他说，只曰天祚我明，必成此事而已。⑥

与鹿继善同为孙承宗幕僚的茅元仪在给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上书中也提到：

夷官王世忠之遣，实有机要，朝廷之上似不宜过疑。督师公（即孙承宗）料理已有头绪，衮衣之思，亦非其至怀。近有诗曰：“朝天应有日，灭贼岂无期?”可以知其概矣。然督师公所以一意在外者，唯相公（叶向高）主藉是倚，相公明农之兴再迟一二载，可见故疆尽复，而后问福庐旧隐。如其言不效，则仪有百口在，颇有确见，未敢尽付墨卿耳。中外

---

① 孙承宗《督师奏疏》卷6，《奏为酌沿海之情形》。

② 《明熹宗实录》卷36，天启三年七月丙申。

③ 《光海君日记》卷21，元年十月辛酉，《李朝实录》第32册，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第202页。

④ 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海集1，《续修四库全书》第1382册，第53页。

⑤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7，《孙承宗行状》。

⑥ 鹿善继《鹿忠节集》卷19，《答张泰宇书》。

尚多震撼，此事关系不小，今中兴成否，全在应此着，处实不在兵饷虏情矣。①

正如这两段引文所显明的，王世忠的行事乃孙承宗早已“打算着数”的精心安排，足见其谋划之深、用心之苦。引文中所谓的“深意”与“机要”，无非就是要招徕海西女真各部、离间乌尔古达与金国的关系。孙承宗对此事相当重视，尽管朝中有质疑之声，但他仍坚持施行。鹿善继和茅元仪将此事与明朝的国运中兴相系，可见其事关系着实不小。

孙承宗的谋划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但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茅元仪《督师纪略》记:

王都堂者，王世忠之兄也，其国亡，遂臣于奴，有文武才略，兼综将相之事。公（孙承宗）既显庸世忠，而又以项俊卿乃襄毅公忠之裔，有德于世忠，每疏保任之，故公并调俊卿出，欲使同世忠将锐骑居广宁城外，托虎酋以为援，而阴招奴酋之灰（扒）、鱼（皮）诸部。虽其事不果，面（而）诸夷闻旧主（指王世忠）在中朝，时有逃来者，故奴疑其兄，遂罢之。奴去一腹心，政事渐紊矣。②

很明显，明朝的挑拨离间是造成乌尔古岱失势的重要原因。可以想象，在金国陷入危机和明金对峙的紧张形势下，明朝的一举一动必会引起金国的注意。对孙承宗等人的行间，金国必然有所察觉、防范，乌尔古岱的失势正是金国对此做出的反应。《孙承宗行状》提到:

我之渐东也，奴惧，遂毁其宫室，北筑宫于沈阳，瓮城屡不就，又惧袭之，渐徙其畜于老寨，而营城于抚顺关外，渐思遁矣。奴老多意忌，以刘爱塔故，杀爱将王丙，又以我间杀伪都堂王世勋，奴旧人兀尔忽达及李永芳俱罢闲，而佟养性、李伯龙、郎通事、李都司用事。郎通事通夷语，善风角，夜为人断其首，大索不获。李都司凶暴，喜杀戮，尝制西帽自随。粮少，杀辽人而夺其粮。辽人怨愤思乱，数夜惊。群奴每相聚而泣。③

前引《孙承宗行状》的记载表明，王世勋即是乌尔古岱，而同一文献的这段引文却把王世勋和乌尔古岱截然视为两人，与所谓“又以我间杀伪都堂王世勋”，显然是作者的误记。尽管如此，这段记载仍能证实明朝离间乌尔古岱与金国之关系的事实，并且，它将乌尔古岱之案与明金对峙局势的变化和金国的统治危机相联系，揭示了该案的复杂性。

即便是在乌尔古岱失势后，孙承宗仍欲借机搅动金国，诱之发兵而后制之。他在天启三年十一月致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书柬中说:

东夷（指金国）近虞猛发而后有可图，西夷（指蒙古各部）近可支撑而后实可惧。东之猜暴以我搅之而日甚，此中似有机局，即猛发于千里，我当有以应之，独恐彼以狙伺不发，为坐困之术，而我更以望困养之，其发更大。然贼中独一二人为狡，不杀我人，或知其去而纵之，为可恶耳。此时辽人归者日归、居者日图，归而敢怨，叛人各有携心，即王世忠之兄兀尔忽答，贼中号为王都堂者，适闻贼疑之，不令管事，但得再搅，此机一动，则贼日孤，而发易制。④

这封书柬所说，尤其是其中的“但得再搅”一语，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乌尔古岱的失势和金国的混乱，与孙承宗等人的挑拨有着直接的关系。

综合前人的研究和本文的考证，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天命八年发生的乌尔古岱一案，不仅是金国最高统治集团权力争斗的结果，也是明朝挑拨离间的结果。这一疑案凸显金国内部权力之争的激烈和明金斗争的复杂性。本文将乌尔古岱案与金国内部的权力争斗、金国的统治危机、明朝的离间联系起来，置于明金对峙的背景下，历史的真相才得以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

---

① 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59，《上叶福清相公书九》。

② 茅元仪《督师纪略》卷8，《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6册，第378页。

③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7，《孙承宗行状》。

④ 孙承宗《高阳集》卷20，《柬叶相公老师》。孙承宗此封书柬并未注明写作时间，惟其中有“门生略理关外几五十日”、“盖门生去年不来”之语，可知书柬当写于天启三年。又据《孙承宗行状》知，孙承宗于天启三年九月八日出关东巡，料理关外，则此书柬当写于是年十一月。